

思维)空间 王赓武

在颠覆性变革时代 反思人文与社科之作用

我很高兴能为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支持的“社会科学与人文学创意节”（Ideas Festival）的成功举办助一臂之力。在过去七年里，我有机会看到理事会所做的工作，这让我相信，新加坡扩展和加强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努力，能够为更多人提供思考的点子。

我必须说，2016年成立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正合时宜。它反映了一些人的担忧，他们认为新加坡作为全球城市，以及面临无法控制的不确定性的民族国家，在知识建设方面存在不足。例如，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开始工作后不久，美国就发现其基于规则的秩序受到挑战。这导致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日趋紧张，直接影响到本区域。随之而来的冠病疫情，则让每个人感受到生离死别的无常。

我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界热烈响应开展新研究的号召。他们看到了利用自己的技能获取新知识的契机，并推动他们研究可能有助于政策制定的问题。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在审议了他们过去七年的提案后，决定举办“社会科学与人文学创意节”。它的覆盖面将非常广泛，涵盖针对全球冲突和快速发展的技术进行多视角研究的可能性。我将重点谈谈人文学科研究在这一大背景下所面临的问题。

我的第一个想法源于亲身经历。我将大约77年前进入一所大学时所处的环境称为“后帝国知识和前社会科学”阶段。对于像我这样的文科生来说，学校并未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做出区分。我今天提起这一背景，是为了与此后学科的激增进行比较。

到了21世纪，人们担心，追求科学化的压力，已使人文学科与世界真正需要的知识建构任务几乎毫不相干。我记得有一段时间，任何诉诸文化因素来解释任何发展的做法，都被视为倒退，对原创性研究毫无用处。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过去七年的研究项目表明，一些新的需求已经出现。例如，将社会科学与科学、科技、工程和数学（简称STEM）研究分开，已不再是僵化和狭隘的做法。此外，新加坡所有机构都设立了许多多学科中心和研究所，以处理一系列新的生活和工作问题。

我一生都在大学里工作，看到这些大学如何艰难地适应新的现实，同时努力保护学科和传统的核心价值。我对所看到的并不感到惊讶。因此，人们认为，确保新加坡独立后能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生

当这些现实情况发生变化时，国家必须做出明智而有效的反应。我们今天所须要的思维转变可能更难预料。我们必须寻求新的想法，并认真加以研究，以确保所获得的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应对未来挑战。

存的经验，应该得到反思，从中吸取教训。它是如何掌握知识和技术，使一个多元化移民社会成为一个全球城市的？新加坡高度重视教育，培养学生掌握发展现代工业经济所需的技能。我们鼓励最优秀、最聪明的学生成为科学家和工程师。

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30年。社会变革和文化适应的问题，在很大程度上靠民间智慧、个人努力和使用监管法律来保护公民免受危险的外部影响。因此，新加坡在长期耕耘的STEM领域获得认可，而本地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却被视为滞后不前。我记得在1990年代和21世纪初，有人曾向我指出这一点，当时大专教育正在快速发展，必须高度依赖外来人才。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方面，它被本区域外发展的理论和方法所主导。植根于本土的学者非常少。我们须要做更多工作来了解我国的多元文化社会，以及它所处的复杂地区。随着世界正在迅速变化，并朝着非常不确定的方向发展，这项工作已迫在眉睫。

我的第二个想法是：对习惯于将西方与非西方区分开来，并以文化上有别于本区域的社会为根据所得到的理论研究成果，我们要如何加以补充？这包括依赖科学方法论来研究社会。我们能否利用社会科学研究的经验，来发展人文科学研究的解释潜力？

我们所在的区域从来没有共同的根源，而是一直对多元性持开放态度，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。人们曾期望殖民列强过去强加于当地社区的现代批判标准，会驱使它们走向单一的文化模式。现在看来，这似乎不太可能实现。如果这一由此产生的、作为本区域每个国家实体基础的多元性继续下去，那将是一个很好的起点，可以研究这种多元性如何改变新的国家、这种开放性如何使其中一些国家由弱变强，同时导致另一些国家衰落。在这方面，我认为，有助于了解精神需求、区分道德价值观，并揭示多层面的社会情感的人文科学研究，可以补充学者和公共部门现有的解释能力。社会科学家和STEM研

究人员在分析科学数据，甚至是尚未收集的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据时，可能会发现其中一些具有启发性。

回想起我自己的帝国进步主义思想和前社会科学的复杂背景，我承认对获取深刻知识的能力不是线性的，也不是单向的，而是可以通过反思的这一事实感到非常激动。我可以看到，这是如何使科学的普遍适用性达到这样的地步：科学家们认识到，创造力和创新并不仅仅依赖于科学。

这就带出了我的第三个想法，它以正在发生的事情为基础，简单而实用。在可行和适当的情况下，我建议鼓励研究人员考虑，让来自不同学科的人员担任联合首席研究员（Co-Principal Investigators）。在这里，没有必要要求每个学者都掌握多种学科。我指的是让人文学者与他们的社会科学和STEM同行共同承担责任。

我也不是在建议应该机械地遵循这一做法。我的设想是，研究课题提议者要对不同观点持开放态度，因为这些观点可能会让他们发现一些他们意想不到的成果。来自不同背景的学者的各种见解使这成为可能。

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是，当学者们在探求新知识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、越走越深时，可以培养他们跨越研究边界的习惯。据我所知，各大学正在朝类似的方向改革课程结构。它们正在培养学生超越学术范围的学习能力，不仅在学生时代这样做，而且让他们做好终身学习的准备。

这对下一代新加坡人来说，是一个巨大挑战。我不禁又回到我的第一个想法，即新加坡独立时所必须做的事情。它必须做出难以预见结果的决定，并迅速实施新的政策，以生存下来。尽管今天的现实情况与以往完全不同，风险也更大，但这一经验教训仍然至关重要。当这些现实情况发生变化时，国家必须做出明智而有效的反应。我们今天所须要的思维转变可能更难预料。我们必须寻求新的想法，并认真加以研究，以确保所获得的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应对未来挑战。在我看来，“社会科学与人文学创意节”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。

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大学教授
新加坡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顾问
本地著名历史学家
本文是他在首届
“社会科学与人文学创意节”开幕式的致辞
黄金顺译